

“历史·现实·未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理论2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纪要

编者按: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20年来,国情、世情、妇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妇女/性别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迫切需要理论研究者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深入探讨。2015年6月16日,《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召开“历史·现实·未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理论2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总结回顾20年来中国特色妇女/性别理论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以下问题:(1)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中推动妇女/性别理论发展?(2)如何看待西方妇女/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如何借鉴西方妇女/性别理论并为我所用?(3)如何基于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妇女理论?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平台,促进学界进一步探讨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今后,本刊将继续召开专题座谈会,以激发更多的交流和研讨,推动中国特色妇女/性别理论创新和发展。

——本刊编辑部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5)04-0005-11

谭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

'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中国妇女和性别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20年来,中国妇女研究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解放思想,深入思考并尝试回答涉及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立足中国国情不断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和方法,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早在1999年,时任会长彭珮云就提出“要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以推动妇女运动的新发展”。2013年,她组织研究编辑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和实践》,对新时期妇女/性别理论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的理论框架,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目标任务、实现途径、主体力量和保障条件。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需要深入研讨和丰富发展的理论问题,例如怎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客观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发展状况及变化,全面理解妇女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的参与和贡献,借鉴国际妇女运动有益经验,探索促进妇女发展、推动性别平等的中国方案。

'95世妇会召开20年来,中国妇女研究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对话、分享不断增多,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代表的妇女/性别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被介绍到国内;基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和方法,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教育、培训及干预项目启发了人们的社

会性别意识；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妇女和性别问题时，如教育、健康、参政、经济参与、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环境发展等，发现了一些原来未曾看到的问题，产生了新思路，找到了新方法。但是，在交流、对话和分享中，我们也发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项目脱离中国现实国情，忽视中国历史文化，割裂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进程，盲目比较，片面分析，生搬硬套西方女权理论，居高临下否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经验，否认马克思妇女观的理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理论困惑。这些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思想警惕和理论反思。

妇女/性别研究需要讲究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脱离中国现实国情和妇女群众需求的理论研究难以真正促进理论和实践的进展，违背社会公平公正价值理念的落后观念指导下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更不可能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动力。目前，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遇到诸多现实挑战，例如妇女就业与生育的关系、夫妻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加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不分良莠地继承和回归传统家庭关系；如何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和家庭文化，制定实施对家庭友好的就业政策，为妇女就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这些都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提升。实证研究不仅要有模型和数据，更要有现实和历史背景分析，要有理论支撑。有的实证研究仅仅追求数据准确、方法恰当和结论合理，用中国数据套用西方理论，缺少对中国国情和妇女需求的理论关怀和理论思考，使研究变成了游戏和盆景。如何立足国情，坚持问题导向，关怀现实，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也是目前妇女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

借'95世妇会召开20周年的契机，《妇女研究论丛》搭建理论平台，组织讨论争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了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思想方法和基本主张，明白社会主义中国在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问题上秉持的原则、理念和做法，理解目前面临问题的历史渊源、现实国情和国际环境，善于用性别等交叉视角看待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身体力行地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自信的态度与国际社会交流和分享中国经验。

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想重点谈谈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妇女/性别研究理论的发展。在当今全球地方化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不但是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文化建设，也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以推动妇女/性别理论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难得机遇。

检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妇女研究，有限的几位主流历史学者涉猎到儒学与妇女领域，如“古代妇女的立世精神对先秦易学中的坤德‘厚德载物’的沿承及发扬光大”(郑必俊)，“宋代重申妇女应‘正位于内’的指向在空间和性别分工方面强化内外之别”(邓小南)，“从先秦到秦汉至唐代经历了‘以伦制礼’到‘以礼入法’的融合变化过程”(高世瑜)，“宋以降宗族制度强化‘家法’的研究”(臧建)等。中青年学者有从性别角度研究儒家原典《周易》《诗经》《礼记》以及后儒的新阐释研究的著作(焦杰、铁爱花等)。我认为(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与妇女/性别相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妇女与性别文化为中心，以唯物史观、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从儒、道、法诸家论说中提取核心词为概念框架，如“伦”和“欲”；后归纳为“伦欲并重的实用性别价值观”“尊卑有等的性别关系制度”和“阴阳二元结构的体用论”(1993)。90年代中期引入社会性别范畴对本土性别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侧重华夏父权制性别制度的建立及结构研究。近几年侧重探索解构(建基于儒学的)活在民间的父权制有无改变的可能以及重建性别平等、和谐社区和家庭的可能。整体来看，妇女与性别研究界对传统文化研究积累太少，势单力薄，功力不逮，缺少资源和凝聚，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下对新儒学的崛起显得迟钝且乏力，呈失语状态，这更需要尽快改变。

当前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妇女理论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不只需要对文本进行全面解读、研究，发掘优秀部分以弘扬之，更要对新儒家进行对

话性研究,尤其需要书斋和实践研究并重,才谈得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需要首先分辨几个概念及其代表的实体——儒学、儒家和儒教:儒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是以辑录文献、研究学理义理、弘扬精华去其糟粕,培养人才为要务,像汤一介、陈来等严谨学者所为;也不乏介入政治者,如马克思主义儒学家方克立、受自由派影响的杜维明等。杜氏提出儒家的“三纲”不可取,需要经过女性主义检视顺应性别平等的世界潮流。而新儒家的“儒教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上全面复古,主张儒教上升为“国教”的“王官之学”,恢复“三纲五常”,复活礼乐仪式,倡新科举制,在农村召唤乡绅治理、重建家族主义……与此同时,制造“去革命”(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革)、“去启蒙”(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与鲁迅精神)的舆论,以兴国学为名,与商业市场为伍举办“国学班”“读经班”“淑女班”,以噱头式的“成人礼”、汉装婚仪以引起轰动……不一而足。原教旨主义的新儒家学说对共产党的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成就造成了巨大冲击,给妇女发展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也给妇女/性别研究、政策制定带来了巨大挑战。妇女/性别研究者应把挑战看作机遇:这既是前所未有地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也是以各种方式开展与传统文化对话、论辩的机遇,更是在实践中检验知识、创新转换范式提供了广阔舞台。

围绕妇女/性别研究学理性、知识性、行动性的需要,我们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地依次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一是了解儒学的演变过程及其重要方面,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比如儒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价值(如“仁”“礼”“孝”)、天/人关系(如“天/人”“阴/阳”)、“公/私”“内/外”“尊/卑”等位置等级关系;二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论述与现代性别平等话语对接,将这些话语纳入制度框架进行分析;三是探讨传统中的价值(体现在概念、命名)、伦理(关系)如何转换创新发展。以“仁”作为人性论和关系伦理的基础在性别关系上如何进行批判性创新改造为例,在儒家论述中“仁”是有男女之别的:“仁者,爱人”是实行仁政王道者的伦理人性基础;而“妇人

仁”是没有远见、感情用事,只适合照顾他人而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进而被视为位卑屈从、温顺柔弱者。再如“孝”,除了一套天人关系的推导外,赋予孝道的实践主要由妇女承担,比较《孝经》和《女孝经》章节数量相同,在对男女尽孝条款中,男子尽显事业成功是最大的孝,具体责任只有三章;女性对公婆、父母、丈夫等具体行孝不下于十章。在这里,如要进行现代转化创新发展,理论上对“仁”应重新界定,在关系伦理和关怀伦理上应是平等对等的,具体的孝行应该是均衡共担的。

事实上,在实践中进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对不平等制度结构习俗的转化创新的探索,比我们想象中要走得更远。如在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进行的撬动父权制家庭和社区规则的行动中,男婚女嫁的婚俗、男性继承的规则,通过村民的讨论、辩论一一被打破,解决了妇女在社区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同时改变了迫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父权规则造成的男孩偏好、家庭不谐、妇女受更多伤害等不和谐状况。在公共事务中,破除了内外分工的藩篱,妇女成为社区依法治理的先锋;在社区和家庭中“继良俗、树新风”成为共识,志愿精神成风,老年协会、妇女手工艺协会、党员志愿者纷纷行动,自觉改变村庄、家庭、个人的面貌。象征家族主义的家谱和祠堂也发生创新性转化:妇女可以写入家谱,不独是儿媳,还有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妇女走进祠堂,向族人讲述妇女榜样的故事;新家风在这里培育,平等与和谐在这里成长。这些行动和探索为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臧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妇女研究从1995年到现在走过了20年,中国和世界也走过了20年,今天的一切和20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任何时候都要将妇女研究的历史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才能看清其成败得失。

现在处在“反思”的时代,西方女权主义在反思,为什么性别研究促使新被发现的女性再次消失?我们的邻居韩国学者在反思,如何建立适应韩国语境、国情的女权主义方法论?中国学术界和妇女研究界

① 指的是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理论与实践”座谈会。

也在反思,如何看待中国的妇女解放历史?究竟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语境来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实践?例如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的讨论会^①,就是反思中国妇女研究理论的重要标志。

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我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努力试图把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史塞进西方理论的框架,这个过程是那么不容易。结果却像钟雪萍所询问的:“女权主义理论多了,而中国曾经的妇女解放精神和男女平等都去哪了?”从研究妇女史的角度,反思认识论上的两个误区,我认为跳不出两个我们需要面对的理论:一个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一个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

首先,面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现在的心情已经不像90年代初期是兴奋、紧张、躁动了,生怕自己不懂,生怕因不懂而被人看不起。我把90年代初接受西方女权主义和清末民初接受西方思想相提并论,虽然没有清末民初那代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求变革求创新,迫切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至少能被看作一个平等的成员,希望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愿望何其相似。如此,就必须接受西方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并以此对中国妇女历史做出与世界史观一致的新解释,这是那个时代可做的选择。而在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女权主义理论与我们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差异极大。我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里,曾分析了女权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多方面不同。直到今天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我们引进西方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女权主义能否重新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

其次,我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或者称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认识存在误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妇女研究界)疏离马列主义成为时尚,一方面很少人像学习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一样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自身的妇女解放历史缺乏梳理、缺少认识。例如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男女平等——来自苏联的影响,几乎完全忽略,甚至忘记了。而明显体现在就业权、受教育、家庭地位方面苏联对中国男女平等的影响,不仅在50年代深入人心,影响到每一个家庭,而且这种为全社会所接受并

受体制保障的男女平等意识形态,直至今日仍然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占有主导位置,已被人们看作社会的常态,既不是苏联的模式,也不是需要争取的权利。

此外,由于我们过于强调中国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上,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方面忽略了社会主义国家行为推动的男女平等是任何个人和组织所无法办到的;另一方面忽略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在内容、纲领、奋斗目标上与西方女权主义的明显区别。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女性主义以人权为基础,强调妇女个人的权利,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强调妇女整体利益和妇女整体的解放,将争取妇女的权利融入争取民族权和国家主权的目标之中。有海外学者最近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概念,运用女权主义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史,以此来探究“被隐藏和删去的社会主义女权史”,进而要用女权主义“重新定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史能否被解释为社会主义女权史?如何回应女权主义重新定义和解释中国妇女解放史时提出的挑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

改革深入发展带给中国人的冲击和反思是强烈的,对于妇女研究理论的反思,顺应了国际上对于“社会主义遗产”的反思,顺应了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在苏联模式影响、西方女权主义、中国式妇女解放共存并相互影响的今天,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理论话题。

闵冬潮(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先谈谈如何看待妇女/性别理论的旅行。如何借鉴西方妇女/性别理论?2012年,我申请了欧盟的项目“玛丽·居里国际人才奖”,这两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工作。我做的这个项目的宗旨是将欧盟以外的知识带到欧盟。但什么是知识?我们中国的知识算不算知识?如何把中国的知识带到欧盟?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现在北欧也非常关注中国,但从学术界来看,国际化也是刚刚开始。例如,我所在的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一百多名教员中几年前只有一两个外国人(北欧地

区除外),近几年才引进了一些国际学者。跟性别研究有关的,做的比较长的是中国北欧性别研讨会,每三年开一次会,现在开了五次了,每次在北欧开会,主要参加者都是搞中国性别研究的人,当地搞性别研究的人不太感兴趣。而她们开性别研究年会时请的主旨发言人大都是英美学者。那么谁的知识算是知识就不用说了。当然,她们当中有些人也在不断反思,英美女性主义对北欧的女性主义的影响,其中的霸权问题、北欧女性主义的主体性等问题。

我一直做关于国外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如何在中国“旅行”的研究。可以说,绝大多数理论旅行的方向都是从西方到东方或从北方到南方。在国外,关于中国妇女/性别的研究,也大多是外国学者或旅居外国的中国学者做的。为了改变这种单向的旅行,这两年我们做了一些“逆向旅行”的工作,把国内学者最新的关于性别平等的研究翻译成英文,今年将在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论文集。让这些不单是“中国制造”也是“中国设计”的知识可以为那些不能阅读中文的人共享。我们把国内的研究推到国外,不能仅是 case,也要有理论的探讨。我们面临很多困难,比如语言上的问题,我们比不了印度,她们的学术用语一直是英语,有些人英语比英美人还好。

另外,我们的视野也需要扩大与转型,别光盯着欧美,特别是美国,一说就是西方女权主义。多年来,我们忽视了拉丁美洲的女性主义,中东欧的女性主义,印度的女性主义,等等。这些宝贵的妇女运动的经验和理论可能是我们更需要了解和学习的。因此,我想说的就是,我们需要一种有选择的(alternative)“理论旅行”,有意识地让那些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识、处于边缘的知识进来。中国与西方在学术上存在权力关系,但是我们既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有策略,有理论自信,不要妄自菲薄,这就需要有一种定力。

妇女/性别这个研究领域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问题也是不少。我觉得存在两个理论上的断裂。一个是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我们要和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1949-1966)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告别。确实,在“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的压制下,大家都想从极

左的思想中冲出来。虽然我们那个时候的关键词是要个人有选择,要追求自由,但当时的思想确实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大的框架下来讨论妇女问题。从我个人来说,从妇女研究整体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社会主义扔了。但我们对以前很多东西都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思考,比如这“十七年”里妇女解放理论的经验有哪些?妇联怎样动员妇女,怎样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做这些工作?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基本都没有怎么了解。进入 90 年代之后,妇女研究对“十七年”中国妇女解放道路问题的反思也中断了。这样一个断裂之后,就没有一个历史感,向前走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就会看不清。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引进了西方性别理论,觉得 80 年代的妇女研究不够正规,没有什么理论,到 90 年代中期后才学科化。这个断裂又把 80 年代妇女研究的积累,很多原来正在反思、讨论的东西扔掉了。例如,80 年代提出人道主义,在阶级的范畴上,加上人的范畴。妇女研究提出,这还不够,还有性别范畴,因此,提出“女性”主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80 年代末就终止了。进入 90 年代之后,妇女研究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有很多共同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去政治化”。怎么去政治化呢?跟臧建老师说的缺乏政治敏感度有联系,也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关系。当时甚至连“政治学”这几个字都成了忌讳,没有人研究政治。“妇女参政”这个词都消失了,后来变成了“妇女组织”研究。因此,出现了一个与理论保持距离的阶段,妇女研究开始很少研究理论,很多人研究比较实际的问题,例如妇女下岗、妇女被拐卖等。有个阶段,“做项目”成了性别研究的潮流,但往往这种项目不需要你研究什么理论。第二个特点是“去历史化”。我们老师都应该有体会,你跟学生讲妇女研究的历史,讲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历史,学生都不了解。80 年代、90 年代更是混为一谈。第三个特点,在实践中“去问题化”,有些研究者的研究与现实问题脱节,好多理论研究,不是从实践出来的,不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转述国外的理论。正好与“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背道而驰。第四个特点就是“去批评”,来了一个新东西我们就去学,不加批评地学,这样我们永远学

不完,我们永远都是学生。我们当了30年学生了,到现在还没有学完。应该怎么用一个批评的方法去看待理论,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已经有所反思,例如,2011年宋少鹏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以及同年在上海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上有很好的讨论。

我们这次座谈会大家谈到的问题,就是要发现断裂之处,接续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但有遗产要继承,也有债务要偿还,反思的工作刚刚起步。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听到前几位老师的发言,非常有感触,也很感动,说明国内妇女研究在理论方面的自觉性越来越强。臧老师刚才提到2011年(中国)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理论与实践”座谈会,并视其为一个历史节点。臧老师是一位资深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节点非常敏感,所以对于臧老师的判断以及她如此重视和定位人大座谈会,我有些惊讶也有些惶恐。当时组织座谈会,只是一种强烈的直觉式的问题意识推动的,当时只是想将问题激发出来,所以没有限定主题,亦没有要求事前准备,但参会者都有一个共同意识,觉得有必要“重估”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机缘巧合,来自海内外老中青十几位学者,带着自己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天马行空地表达意见,互相激发。事后整理录音,发现已涉及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不愿让这些宝贵的思考流逝,所以才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一遍遍地看录音的誊录稿,理出大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按问题整理大家的观点。如果说这个座谈会有些价值,是当时在座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借今天这个座谈会仍想强调一点,在讨论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时,西方女权主义客观上成为比照对象,这当然是因为中国早已身处全球,且与西方学术在全球学术结构中的霸权地位有关,但“重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的目的,绝非是狭隘地以“中国中心”取代“西方中心”,而是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想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资源,毕竟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出现的,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之外寻找思想资源。作为历

史事件,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相对消沉、西方各类女权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强势传入,与中国全面市场化,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当时就有老师提出我们传进了什么,什么没有传入的问题。正如臧老师敏锐地指出,当时人大座谈会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尽管学者的立场和判断各不相同,针对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日益成为显学,其中也有一种努力是希望正面理解和挖掘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价值。其中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新自由主义正在面临的危机和各种抵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整理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让“妇女”重新回到结构性的重大社会议题中,这本身就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色和宝贵遗产。否则我们会陷入就“性别”说性别的学科隔离状态,当妇女研究只是应对“妇女问题”时,那才是真正把妇女“问题化”了。我们更要看到制造“妇女问题”的社会结构。

开会伊始,谭老师就提出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帮我们理清出不同层级的“理论”,厘清层次,让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至于越位,造成我们思想的混乱。“理论”可以是宏观的范式层面的,也可以是微观的A与B相关性的假设或是分析框架。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我受各位老师的启发,有一个意识逐渐清晰明朗起来:“妇女解放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是两个层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管是出于原典的哲学阐述,还是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宏观层次的理论范式,是规范层面的,回答妇女为什么受压迫以及妇女解放的可能道路。“社会性别理论”是一种分析框架,属于经验研究层面。比如,中国学者熟悉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说法,社会性别是一种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两个层级的“理论”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但90年代伴随“社会性别理论”的传入,一方面激发了(各学科)大量的学术研究以及公共政策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对于“妇女解放理论”的解构压力。之所以造成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解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把两个层级的理论混淆在一起,以为是范式的替换。

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框架一起传入中国学界的是对“五四妇女史观”的批判,质疑和挑战中国妇女都是“被动”“牺牲者”(客体)的受压迫者形象。一方面,这种批评对统一刻板的“受害者”妇女形象的解构以及对妇女“主体性”的挖掘激发出大量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于我们增进各时期各阶层妇女丰富生活的理解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批判无意中呼应了后革命时代对于革命的解构思潮和呼吁(个体)“主体性”的市场时代的意识形态需求。这种时代效应也许远远超出了学者的学术意图,只是学术文本的溢出效应或者说是学术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妇女解放理论”是一种革命理论——寻求推翻压迫妇女的旧制度,创建一种男女平等的新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诞生的“妇女史”(确切地说是“妇女压迫史”)和妇女解放话语,曾经是革命史和革命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后革命时代,去革命化又与解构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实践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解放”,妇女没有主体性;反之,对儒家秩序下各类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才女、贞女烈妇)的重塑,从前后两个时段同步挤压,参与到对革命及其压迫—解放话语的解构中。但是,用“主体性”去解构五四革命史观,事实上同样存在着错位性误解,核心就是规范与经验的错位。正如对于“五四妇女史观”提出再思考的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准确地指出了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把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而“‘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没错!任何一种范式理论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不把“意识形态”作贬义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亦是。但是把对某种社会制度的规范性判断理解成是对所有历史事实的经验判断,同样可能是一种“分析上的混淆”。一种社会制度存在对妇女的“压迫”,这是对“制度”的规范性判断,支持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人为了证明这种规范性判断的正当性,选择性使用各种事例或者文化表现,比如祥林嫂的形象,来证明这种现存制度的不正当性。这种规范判断往往是基于某种规范性价值,尽管规

范性价值的内涵可以争论,但规范性价值本身是讨论的出发点,不应被质疑。当去政治化的“主体性”穿越以等级为规范的前现代社会和以平等为规范的现代社会时,这实质上是规范使用的历史性错位。“妇女解放”的正当性来自于“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取代“等级”和“专制”成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和社会组织原则。在“平等”和“自由”原则的观照下(尽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平等”与“自由”内涵及其排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儒家秩序中等级安排、妇女的屈从地位已然不正当。所以,革命理论所强调的儒家秩序对于妇女的压迫首先是制度性的压迫。尽管为了显现这种制度性压迫,作为革命史范畴的“妇女史”有意识地把妇女建构成“受害者”形象。受社会性别理论影响的妇女史把聚焦点从宏观体制本身移向制度内生存的具体的个人,对于妇女主体性的挖掘,以及对流动和互动的微观权力的青睐(革命理论看到的是制度性的权力分配模式,而微观权力看到的是流动和互动的权力关系,对于后者,不存在完全无权的人),客观上放弃了对儒家制度本身的规范性评判,对制度的规范性判断本身就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规范理论与经验研究(包括史学)的学科错位,造成了“妇女解放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原本并不冲突而有可能互相补益的两个层级的理论之间的错位性对抗。事实上,高彦颐并非全然反对制度压迫,她提倡“受害”与“能动”“双焦点”的视角,她质疑的是经验层面上笼统地把妇女视为“受害者”,把典籍标准、制度安排看成事实存在,这种批评在经验层面上至今仍是有效和重要的。同理,对于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张扬,并不能取消革命理论对于“制度”的批判。从不存在没有任何能动性的主体,不管是适应、反抗或是权宜之变,都是主体在制度结构下的能动生存。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当前学术上出现忽略或搁置妇女解放理论未必都是否定革命的正当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身处后革命时代的建设时期,大家基本搁置了对社会基本体制正义性的规范讨论,去政治化的社会性别理论正好填补了这种需求。

以上,是我对“妇女解放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的粗浅理解,也算是间接回应了此次座谈会事前

布置的三大问题:如何对待(儒家)传统、如何看待西方的性别理论、如何面对现实问题。这三个问题实质有内在统一性,问题的关键不是中西的问题,而是立足当下中国的问题,我们能用什么理论和思想资源去回应。对于现实经验问题,社会性别视角仍是必须的,社会性别理论仍是有效的分析框架。只是想强调社会性别视角并非只是观察性别之差异,也并非只强调妇女的“主体性”,还要看到这种能动性只是结构下的有限能动,要看到性别体制对于主体的约束性这一面。关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且“传统”本身也是流变的。只是在“革命”与“去革命化”的话语争夺中,“儒家传统”一直是核心焦点。我们同样要区分作为“文化”的儒家传统与作为“制度”的儒家传统。“传统”实质是当下的问题,我们仍需要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看这一“传统”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以及对于妇女的制度性排挤和压迫。作为“制度传统”,正如我在前面论证的,儒家的等级秩序与现代社会的平等价值规范是冲突的。至于“文化传统”,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需要辩证和创造性的视野。暂抛开具体的等级内涵,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儒家思维模式也许存在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比如,在儒家秩序中,重视性别秩序、重视妇女、重视女德(女德的内容需要讨论),妇女并非不可见。关爱伦理、集体主义在市场社会里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这也是儒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一,希望以传统礼俗来重新打造和拯救被市场和资本摧毁的社区和传统人伦。西方女权主义批判独立自主的原子化个体是一种男性化的自由主义,但其关怀伦理却从母性中来建基,容易滑向本质主义,而中国的关怀伦理和集体主义根源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但是,不经过女权主义检讨的儒家文化的简单复兴和回归,却可能复兴对妇女的压迫,把美德变成压迫和剥削妇女的遮羞布。

韩贺南(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

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近20年来我们在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些什么。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脉络:20世纪80年代侧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基

础理论研究;90年代初主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90年代中叶以后,着重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先进性别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80年代初,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之初纷至沓来的性别问题和国际社会主义低潮的大背景,一方面,寻找解决性别问题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要表明立场,中国妇女运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其核心概念是妇女问题,主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以及它的产生与发展问题,着力解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9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其核心概念是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着重阐释妇女解放的条件、历史进程、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问题。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人们认识上的困惑,例如为什么经济发展了,性别问题却更加彰显复杂。90年代中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其核心概念是妇女发展、男女平等,并拓展了男女平等概念的内涵,着重阐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先进性别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努力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近2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不断推出新的研究问题,拓展核心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创新理论观点,如彭珮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男女平等涵义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关于如何将妇女发展纳入社会发展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纳入”与“合入”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入”与“契合”概念;关于新时期推动妇女发展的方法,提出了“协同运作论”,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坐标上,以妇女为主体,以妇联组织为桥梁纽带,以政府为支持者,全社会参与,协同运行,推动妇女发展,等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创新。其次,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译介与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女权主义认识论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妇女研究中就有所体现,诸如,“有性人”概念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关系的反思,仅从文本而言依稀可见女权主义立场与经验的痕迹。不可否认,女权主义是中

国学术研究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我们对待其他国外学术理论的态度一样,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毋庸讳言,女权主义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容易遭到误解,甚至被污名化,这里有更复杂的学术上的性别问题需要反思。再次,是性别视角的多学科研究。这一领域相比上述研究,90年代中叶以后更为繁荣。我认为,至少目前在中国,社会性别(gender)还称不上系统的学术理论,它只不过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我们将它界定为秉持男女平等的价值观,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视域。社会性别分析着重观察社会现象中的社会性别是如何呈现的、为什么这样呈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研究近20年来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已经转化为政策和法律,可喜可贺!但在学术上抽象出跨学科的中国性别理论还有待时日。

第二,目前和未来的妇女/性别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困难。仅从学术角度而言,学术范式是一个很难突围的问题。国际认同的学术范式、国内主流学科学术范式的双重考量使一些妇女/性别研究者感到困惑,使许多研究成果难于走向世界和进入主流。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是批判式的,我们是建构式的。过去我们认为主要是研究方法问题,现在看来,整个研究范式都有差异。多学科的性别研究,或者说,许多学科采用了性别视角,就使妇女/性别研究归属于不同的学科,同时也使妇女/性别研究的特性消减。此外,主流学科范式的考量,也在某些方面对妇女/性别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为例,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关注如何将男女平等概念具体化,关注基本理论原则之下的“中层理论”,如何在妇女运动实践中操作,这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注重宏观理论和逻辑方法的学术范式有所不同,这使具有妇女/性别研究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这在学术观点的发表和基金项目申请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第三,关于妇女/性别理论与女性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是妇女运动实践和理论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学科的发展成熟对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妇女/性别研究多

学科化、实证化趋势彰显,淡化了妇女/性别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科化热情。但同时,也为进一步学科化做了一定的学术积累,需要进一步梳理、提升多学科妇女/性别研究的成果,建构创新理论,从学科制度与建制两方面推进学科建设,这会使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有更好的学术背景。

鲍静(《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与西方妇女运动有着较大差异,不充分认识和研究好这种差异性,就无从谈中国的妇女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决定了中国妇女问题的走向。妇女/性别研究应立足国情。对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多重并进的跨越式历程。我们通过对新中国“四化现代化”的解读,就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四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的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在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展开,其重要的展现形态是“城镇化”——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向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国家的必有之路。八亿农民的城镇化,绝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迁移,而是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的一场革命,是与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告别,这种“乡愁”岂是一个“愁”字能了得的?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学艺术、历史宏著、文字表达、人情世故、价值理念等等,哪个不与小农经济血肉相连?我们多少人梦想退休后的生活,就是陶渊明式的。如果说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国情,那么几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农耕文明,才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又碰到了新技术革命。几千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世界”和“文明世界”,现在人类又创造出一个“虚拟世界”——一个基于数字所构建起来的网络世界。比较铁器带来的农耕文明,蒸汽机带来的工业文明,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迅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

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应在解构的同时进行建

构。从世界历史发展维度上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开放的、解放的历史,是一部追寻现代化的历史。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为“救亡图存”,先觉者们开始寻求出路。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发表了《论女学》一文。梁启超强调“女学”与“保国”“保种”“保教”间的关联性,女性是否接受教育、是否身体强健,都开始与国家民族的延续和强盛问题划上等号。要强国保种,首先就要兴女学和废裹脚。晚清政府于1897年开始兴办女学堂,并派遣女性留学海外。康有为在1898年《请禁妇女裹足折》中,正式构建使用“妇女”这一词汇,康有为、梁启超的废缠足运动便由此产生,率先倡导“天足运动”,并建立了“天足会”和“不缠足联盟”。开始把缠足的“妇”和“女”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和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的妇女解放开始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紧密相连。

时至今日,在中国“新四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以思想解放的姿态,面对新的解构与建构?

社会性别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后,为人们认识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为女性,我们从小就面对对男强女弱的认知停留在因生理差异而产生的不可改变的暗示。而社会性别理论则强调,人是被社会化的,从出生起,家庭和社会就不断在塑造社会期待的男人和女人。社会关系的解构与建构是一定离不开特定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及妇女解放理论的发展及其实现路径,一定是中国式的、中国特色的、中国语境的。

妇女/性别理论应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待妇女问题。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人类共同追寻的理想。早在19世纪傅立叶和恩格斯就断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重申:“妇女的进步就是全人类的进步”。毛泽东从1917年12月到湖南省浏阳县进行社会调查开始以革命者的眼光关注妇女问题,到1976年逝世为止,60年中始终如一、自发自觉地从事和领导妇女解放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妇女解放和发展问题,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妇女的解放与发展离不开人的解放,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跳出妇女问题来解决妇女问题,要跳出单纯的以妇女理论来研究妇女理论。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是涉及人的发展问题。相比男性的社会角色,女性还兼有很重的家庭角色,如何很好地兼顾双重角色不仅是女性的责任,也是男性的责任。因此,我们的妇女理论研究和妇女发展实践都离不开对男女两性的共同研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研究和解决相关机构、法律法规、政策产出、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碎片化和封闭化的问题,如利用国家社科基金调配学术资源和学术力量,增强学术界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关注和运用;吸纳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尤其男性学者加入研究队伍,扩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调动男性和全社会来关注家庭建设;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和运用等。

蒋永萍(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

我虽多年来主要做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但一直以来都认为基本理论对应用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测量与评估”等量化研究时就感觉特别需要理论的支撑,需要首先厘清概念。比如我们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时,就需要清楚地界定什么是性别平等,什么是妇女发展以及二者的关系怎样;做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时,首先要清楚妇女地位的概念与内涵,形成并确定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测量分析的基本理论认识,然后才能设计指标和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所以说,妇女/性别基本理论的探索不论对于史学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应用性研究也应该对基本理论的建设做出贡献。

在基本理论研究中,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中国语境下的性别平等、性别歧视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平等的异同,男女平等基本原则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差异是什么,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仅需要深入浅出的研究,更需要在公众中反复辨析与宣传倡导。近些年来,性别理论和性别问题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甚至成为社会关注、公众讨论的热点。比如,关于央视春晚节目

涉嫌歧视女性的话题讨论,本来这是一个正本清源、公众倡导的极好机会,但从网络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参与讨论的各方对问题缺乏基本的共识,导致很多问题没法抓住本质,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一方面反映了理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界没有尽到对研究成果进行社会转化和传播基本理论的责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妇女/性别研究中存在忽视基本理论的问题,比如,一些研究不界定“问题”的概念是什么,就去谈有什么“问题”;再如,一些研究中,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混用的。而在我看来,它们一个是价值标准,另一个是行动策略与手段,我们现在做男女平等的国策宣传,也在做社会性别主流化评估,至少要把这两点弄清楚。所以,我特别赞赏中央领导在中国妇女“十一大”致辞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比如“三个平等”的战略思想,即“确保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再比如“要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立法决策中充分体现性别意识,在改善民生中高度关注妇女需求,在社会管理中积极回应妇女关切,使男女平等真正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社会生活各方面。”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对男女平等的内涵做了更深入的阐释,而且提出了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路径。

如何基于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妇女理论?我认为,理论建设包括宏观的,甚至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适性理论,也需要中观的,适用于解释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现象与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理论研究中,形成和发展中国本土的中观理论特别重要,它不仅可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是丰富发展普适性妇女/性别理论的需要。中国的现实问题研究应有更多的理论关怀,不仅关注妇女/性别平等发展与问题的现状,还应回答诸如性别与发展、性别分化与阶层分化的关系等这样的理论问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在发展的同时,差异扩大。具体表现在:一是群体差异的扩大,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身份的女性不仅境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也有较大差异;二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同领域的发展状况不尽相

同,有的领域处于总体持续向上的走势,比如,健康、教育、社会保障、法律政策环境的构建,有的领域处于迂回发展的态势,如经济就业、参政、性别文化环境;有的领域进步和问题都很突出,如在婚姻家庭领域,某些群体的女性在家庭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传统的角色规范、分工模式还在制约一代代妇女以及不同阶层妇女。在这样的情势下,需要在把握总体状况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分层、分专题的研究,在找到影响不同群体妇女发展的关键问题的同时,探寻性别与发展的规律性动因,以及阶级、地域身份、年龄与性别的交互关系。把中国的性别问题和妇女发展问题说透、说清楚。

中国妇女/性别问题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回应现实需求,关注宏观社会发展对妇女的影响。我觉得宏观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很多涉及妇女的利益和发展。如“单独二胎”政策在落实中如果缺乏性别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来性别平等问题;全职太太问题与公共服务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互联网+”会对妇女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做研究。再比如,在家庭问题研究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体现了对家庭问题的重视,对妇女研究和妇联工作定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作为研究者,一定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家庭和妇女的关系是什么,家庭政策的性别视角到底应该怎么体现?这都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另外,目前关于妇女工作和当代妇女运动的研究也还比较薄弱。如果妇联做的事情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那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在哪儿?妇女组织的妇女工作也需要相关理论的指导和支持。

谭琳书记在座谈会小结时谈到,这次集思广益的座谈会是个好的开始,讨论还要继续下去,今后我们还要就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与妇女和性别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妇女研究论丛》、中国妇女研究网等渠道,不断搭建多种平台,联合多个学科和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妇女/性别理论的深入发展。

责任编辑:玉静

“历史·现实·未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理论 2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与此同时，妇女/性别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多样，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6月16日，《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历史·现实·未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理论2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由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妇女研究论丛》执行主编杜洁主持。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妇女研究所所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谭琳同志首先肯定了'95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尤其是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她也指出，目前有些理论研究和实践项目存在脱离

中国国情、忽视中国历史文化、割裂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进程、盲目比较和片面分析等现象，值得警醒与反思。她强调，妇女/性别理论研究要讲究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妇女群众的需求，以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公平公正理念为价值指导，真正促进理论和实践的进展。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深入探讨了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中推动妇女/性别理论发展，如何看待西方妇女/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如何借鉴西方妇女/性别理论，以及如何基于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妇女理论。一些观点引发了与会者的深刻共鸣。

此次座谈会为促进学界进一步探讨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搭建了平台，对新时期立足本国国情回顾与总结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推动妇女/性别理论创新、应对现实问题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玉静供稿 庆红摄影)

